

“一带一路”浪潮的生成^{*}

——基于空间模型的分析

温 尧 谢蒙莹 陈 冲

【内容提要】 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已有140个国家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这本身是一个令人瞩目的世界政治现象。然而,学界尚未结合经验证据系统性地理解“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扩散的过程和规律。作者从结构层面来理解“一带一路”的全球扩散,将其在国际社会的接纳过程理论化为“浪潮”——众多国家采纳相同政策的集群——的生成过程。在区分浪潮的触发机制和推进机制两个维度的差异后,作者将共建“一带一路”视为一种纵向能动型浪潮。作为“一带一路”的发起者和倡导者,中国的纵向力量对这一浪潮的触发具有关键影响;浪潮的推进时机取决于参与国的能动性,它们的积极态度和选择对于“一带一路”的全球扩散不可或缺。在推断浪潮属性及其可观察影响的基础上,作者构建了一个涵盖192个国家在2014—2019年是否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原始数据集,并借助一系列空间模型实证检验影响各国参与的具体因素。统计结果表明,各国加入“一带一路”的选择在时间和空间上呈现明显的集聚特征,邻国是否加入和中国的政策规划等因素对一国加入“一带一路”的决定有显著影响;相比之下,一国与中国双边关系中的变量没有显著地影响该国的政策选择。这一研究在理论和实证层面深化了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全球扩散的总体理解,对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一带一路”;国际扩散;触发机制;推进机制;邻国效应

【作者简介】 温尧,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上海 邮编:200433);谢蒙莹,复旦大学全球公共政策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上海 邮编:200433);陈冲,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助理教授(北京 邮编:100084)。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21)02-0134-21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应用大数据技术预测全球突发重大危机事件引发的社会骚乱研究”(项目批准号:20CGJ015)的阶段性成果。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文中疏漏由笔者自负。复制本文结果的数据和R代码以及本文的在线附录可以在Harvard Dataverse(<https://doi.org/10.7910/DVN/N8B5BC>)下载。

一 引言

习近平于2013年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中国从此开始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历程。此后,与中国签订共建协议、备忘录等“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数量逐年增长。截至2021年1月,与中国签署共建合作文件的国家数量已经达到140个。^①对参与国而言,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意味着其在官方层面肯定并支持中国的这一倡议。在较短时间内,“一带一路”由中国一国发起的倡议变为众多国家共同参与的社会现实。如何理解“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的扩散,这一过程展现出怎样的特点和规律?本文试图在结构层次上对“一带一路”的总体发展历程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

本文的理论和实证框架不仅关注中国及其他国家的能动性,还考察这种能动性在结构层次上产生的结果。习近平指出,“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②这个比喻表明“一带一路”建设不可还原为单个行为体的行动;相反,它是一种结构化现象。“一带一路”的发展历程不只是单个国家回应或中国与单个国家间互动的结果,而是众多国家互动共同造就的动态现象。在质性层面,本文将“一带一路”的全球扩散抽象为世界政治中的浪潮(wave),即一个时间段内的政策或政治现象集群(clustering)。具体而言,“一带一路”的扩展是由纵向力量触发的、由参与国主动调适的浪潮。在实证分析层面,本文利用各国加入“一带一路”的时间和空间原始数据,探索这一浪潮发展形成的具体规律。经过空间统计分析发现,各国加入“一带一路”在时空上呈现集聚特征,中国的政策规划和邻国选择等因素对一国是否加入有显著影响;相比之下,一国与中国双边关系层面的一些变量并没有显著影响该国加入“一带一路”的政策选择。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引言;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讨论浪潮视角对加深“一带一路”理解的潜在贡献;第三部分引入世界政治中浪潮的分类方法,探讨“一带一路”浪潮的属性;第四部分为实证检验,探究“一带一路”浪潮推进过程的影响因素和时空规律;第五部分在定性和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提炼“一带一路”浪潮维持和扩展的启示,并总结本文的研究发现和意义。

① 《已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一览》, <https://www.yidaiyilu.gov.cn/gbjg/gbgk/77073.htm>, 访问时间:2021年1月25日。

② 习近平:《迈向命运共同体 开创亚洲新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载《人民日报》,2015年3月29日。

二 “一带一路”的结构研究视角

在2014年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习近平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应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①这三条原则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深化不仅需要中国发挥能动性,更依赖其他国家发挥各自的能动作用。一方面,围绕中国的能动性发挥,既有研究或将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视为大国政治博弈的案例,^②或从外交思想和战略层面分析中国发起“一带一路”倡议的动因和考量,^③或在具体操作层面分析中国推进“一带一路”的模式、特点及挑战。^④这些研究将中国视为核心能动者,凸显了中国作为发起国在“一带一路”的启动和推进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另一方面,既有研究也关注其他国家对“一带一路”的认知、态度及作用。这类研究一般

① 习近平:《弘扬丝路精神 深化中阿合作——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年6月6日。

② 薛力:《美国再平衡战略与中国“一带一路”》,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5期,第56—73页;赵洋:《中美制度竞争分析——以“一带一路”为例》,载《当代亚太》,2016年第2期,第28—57页;黄琪轩、李晨阳:《大国市场开拓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模式比较及对“一带一路”的启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5期,第103—130页;门洪华:《“一带一路”规则制定权的战略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7期,第19—40页;谢来辉:《“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的关系——一个类型学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期,第34—58页。

③ 高程:《从中国经济外交转型的视角看“一带一路”的战略》,载《国际观察》,2015年第4期,第35—48页;钟飞腾:《“一带一路”、新型全球化与大国关系》,载《外交评论》,2017年第3期,第1—26页;王亚军:《“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创新与典范价值》,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3期,第4—14页;秦亚青、魏玲:《新型全球治理观与“一带一路”合作实践》,载《外交评论》,2018年第2期,第1—14页;高程:《中美竞争与“一带一路”阶段属性和目标》,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4期,第58—78页;王玉主:《中国的国际社会理念及其激励性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一带一路”建设》,载《当代亚太》,2019年第5期,第4—29页;李向阳:《“一带一路”:区域主义还是多边主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3期,第34—46页;李向阳:《“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与机制化建设》,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5期,第51—70页;Yong Wang, “Offensive for Defensiv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China’s New Grand Strategy,” *The Pacific Review*, Vol.29, No.3, 2016, pp.455—463; Yiping Huang, “Understanding China’s Belt & Road Initiative: Motivation, Framework and Assessment,”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40, 2016, pp.314—321; Hong Yu, “Motivation Behind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s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26, No.105, 2017, pp.353—368。

④ 周方银:《“一带一路”面临的风险挑战及其应对》,载《国际观察》,2015年第4期,第61—72页;薛力:《中国“一带一路”战略面对的外交风险》,载《国际经济评论》,2015年第2期,第68—79页;薛力、肖欢容:《“一带一路”倒逼中国外交决策机制改革》,载《东南亚研究》,2016年第2期,第57—63页;柳建文:《“一带一路”背景下国外非政府组织与中国的国际区域合作》,载《外交评论》,2016年第5期,第1—30页;傅梦孜、徐刚:《“一带一路”:进展、挑战与应对》,载《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3期,第87—96页;叶海林:《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风险及其防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0期,第122—142页;Lee Jones and Jinghan Zeng, “Understanding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eyond ‘Grand Strategy’ to a State Transformation Analysis,”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40, No.8, 2019, pp.1415—1439。

聚焦于单个国家,特别是有地缘政治意义的国家,例如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东南亚国家和欧盟国家等。^① 这些研究表明,“一带一路”的顺利推进离不开其他国家的积极参与或施加正面影响。

既有研究的两种视角分别突出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能动性,若将二者结合起来看,恰好呼应了中国倡导的“共建”精神。由于这类研究往往聚焦于中国或其他某一国家,只能体现单一国家在“一带一路”中的作用,因此不能描述“一带一路”推进过程的全貌,也不足以全面地检视各国能动性交汇之后所产生的系统结果。本文既关注一国独立的能动性发挥,也采用结构视角研究“一带一路”的共建问题。启动和推进“一带一路”根植于众多能动者的行为,各国独自发挥能动性是共建的必要元素;与此同时,不能将共建“一带一路”简单还原为一个或几个能动者行为的总和,而应视为系统性动态,即所谓的“涌现属性(emergent properties)”。^② 事实上,一些学者提出的政策建议已经隐含了结构层次的“涌现属性”。例如,祁怀高和薛力按照各自的标准识别出了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支点国家”。^③ 这些国家不仅可能将“一带一路”倡议在本国深化落实,而且有潜力成为“一带一路”的枢纽和“辐射站”,助力该倡议在其邻近国家和地区的推进。这表明不同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一方面依靠单个国家及中国发挥能动性,另一方面各国的参与行为存在着相互联系且无法简单还原到个体。正如高程所言,中国选取支点的目的不在于简单经营双边关系,而是连点成面,最终形成

① 林民旺:《印度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及中国的政策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5期,第42—57页;马建英:《美国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反应》,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0期,第104—132页;黄凤志、刘瑞:《日本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与应对》,载《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11期,第37—62页;张骥、陈志敏:《“一带一路”倡议的中欧对接:双层欧盟的视角》,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1期,第36—52页;李晨阳、宋少军:《缅甸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和反应》,载《南洋问题研究》,2016年第4期,第20—30页;吴杰伟:《菲律宾社会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反应》,载《南洋问题研究》,2016年第4期,第31—42页;米拉、施雪琴:《印尼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和反应述评》,载《南洋问题研究》,2016年第4期,第79—91页;顾强:《越南各阶层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与态度及其应对策略研究——对越南进行的实证调研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6年第5期,第97—109页;塞巴斯蒂安·哈尼施:《德国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初期评估》,载《欧洲研究》,2018年第3期,第117—134页;张赛群:《马来西亚“一带一路”差异化认同:原因、风险及启示》,载《国外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第24—31页;沈予加:《澳大利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及原因探析》,载《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8期,第87—98页。

②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Alexander Wendt,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1, No.3, 1987, pp.340—344; Seva Gunitsky, “Complexity and Theories of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5, No.1, 2013, p.39.

③ 祁怀高:《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支点国家发展战略对接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版;薛力:《中国“一带一路”战略面对的外交风险》,载《国际经济评论》,2015年第2期,第77—78页。

“一带一路”网络。^①

“一带一路”当前已经在全球层面展开,但关于该倡议如何由“点”串成“面”的研究依然缺乏。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将关注点从个体的能动者层次转向整体的结构层次。“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短短几年内便有众多国家正式接受这一倡议并表态愿意参与共建,形成了典型的政策集群现象。本文认为使用浪潮概念考察“一带一路”的共建过程在理论、实证和政策层面都有一定优势:一是为宏观把握共建“一带一路”的结构性特征提供理论基础。浪潮概念从结构层面描绘了多个国家政策采纳或政治变化的动态过程,这一视角既关注中国及其他参与国的能动性,更突出能动性基础上的涌现属性。二是为开展实证研究奠定基础。通过区分世界政治中的不同浪潮以及分析共建“一带一路”的特征,可以在质性层面具体推断“一带一路”建设过程的属性,并使之与其他不同类型的浪潮加以区别。基于此,本文推断出“可观察的影响(observable implications)”,结合经验数据进行大样本定量分析,探索“一带一路”浪潮的形成规律,进而检验不同个例之间不易直接观察的跨国影响。三是呼应中国倡导的“共建”“合唱”的精神内涵,并提出相应的政策评估及建议。对“一带一路”浪潮的分析根植于中国既有的政策宣示和外交实践,凸显了中国及其他各国发挥能动性所产生的跨国结构性变化。在定性推断“一带一路”浪潮并且实证探究其时空规律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揭示共建“一带一路”的宏观特征和潜在议题,为相关政策讨论提供有益抓手,以便更好地维持和推进“一带一路”浪潮。

三 “一带一路”浪潮的属性

浪潮概念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关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讨论。亨廷顿发现,某些特定历史时期会出现一批国家相继开展“民主化”或回到“非民主”状态的情形,即所谓“民主化浪潮”或“逆民主化浪潮”。^② 后续研究保持了对浪潮现象的关切,并围绕民主测度或民主化判断等实证问

① 高程:《从中国经济外交转型的视角看“一带一路”的战略性的》,载《国际观察》,2015年第4期,第44—45页;高程:《中美竞争与“一带一路”阶段属性和目标》,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4期,第75页。

②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pp.15-16.

题展开了持续争论。^① 本文将世界政治中的浪潮现象定义为:在一定时期内,较多数量的国家相继采取相同政策或出现类似政治现象而形成的集群。^② 由于在触发机制和推进过程等质性层面存在区别,不同浪潮中的个体能动性也有差异。根据浪潮触发因素和浪潮推进时机两个维度,本文区分了四种不同属性的浪潮:纵向结构型、纵向能动型、横向结构型和横向能动型。基于这一分类法,本文提出“一带一路”是一种纵向触发的、由各国国内进程调控的浪潮,各参与国的能动性在“一带一路”浪潮推进过程中得到体现,从而彰显了“共建”的精神内涵。

(一)世界政治中的四类浪潮

为了更精准地探究具体案例并且展开比较分析,有必要对不同属性的浪潮加以区分。本文借鉴谢瓦·古尼茨基(Seva Gunitzky)的分类思路,提出区分世界政治浪潮的两个维度——触发机制和推进机制,进而演绎出一种关于浪潮的四分框架。^③

第一,浪潮有纵向和横向两种触发因素。纵向和横向是根据国际政治中的权势结构划分的。如果某一浪潮是由体系层次、自上而下的变化触发的,可称之为纵向浪潮,这种浪潮通常来自大国政治的变化。^④ 大国政治变化可能是激烈而突然的,例如世界大战、经济危机或大国突然解体。大国权势对比迅速改变导致利益格局突然重组或国际规范深刻变迁,世界各国对某种政策或观念的支持也会随之发生剧烈变化。^⑤ 大国政治变化也可能来自自身的政策和理念调整。作为国际秩序最重要的参与者和塑造者,大国往往有着丰富的资源,可以通过威胁、劝服和引诱等手段推动某些观念和政策

① Charles Kurzman, "Waves of Democratization,"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33, No.1, 1998, pp.42-64; Renske Doorenspleet, "Reassessing the Three Waves of Democratization," *World Politics*, Vol.52, No.3, 2000, pp.384-406; Kurt Weyland, *Making Waves: Democratic Contention i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Since the Revolutions of 1848*,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Stephan Haggard and Robert Kaufman, "Democratization During the Third Wav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19, 2016, pp.125-144; Svend-Erik Skaaning, "Waves of Autocrat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A Critical Note on 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Democratization*, Vol.27, No.8, 2020, pp.1533-1542.

② 这一定义排除了一般字面意义上的自然或生物现象的集群,例如传染病、气候变化或地质现象。参见 Seva Gunitzky, "Democratic Wave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16, No.3, 2018, p.636。

③ Seva Gunitzky, "Democratic Wave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p.637-643.

④ 在少数情况下,全局性变化也可能外生于大国政治,比如传染病大流行触发的政治或政策集群现象。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提醒。

⑤ G. John Ikenberry,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John Owen, *The Clash of Ideas in World Politics: Transnational Networks, States, and Regime Change, 1510-201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Seva Gunitzky, *Aftershocks: Great Powers and Domestic Reform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在其他国家生根发芽。^① 由于大国政治变动往往给世界政治带来多维度的深远影响,因此纵向浪潮通常涉及较多的国家和地区。

横向浪潮依赖国家间经贸往来、政治联系和社会文化纽带等横向关系,其覆盖国家往往仅限于某一区域,与大国政治的关联较小,不涉及类似纵向浪潮那样的全局性世界政治变化。2011年西亚北非局势动荡是横向浪潮的典型案例。卢肯·韦(Lucan Way)指出,西亚北非局势动荡爆发前的该地区不存在纵向力量积极促动民主化,反而存在着牵制民主化进程的国际环境。^② 尽管如此,媒体和网络的信息传递、政治社会结构的相似性、参与者对于邻国局势的知觉和错误知觉等横向跨国因素最终触发了这一社会运动浪潮的生成。^③ 值得注意的是,此处对纵向和横向的区分聚焦于浪潮的触发阶段,而在浪潮的推进阶段,纵向和横向力量都有可能起到一定作用:一个由横向联系触发的浪潮在发展进程中或许会有大国政治因素介入,而一个由纵向变化触发的浪潮也可能在推进过程中受到国家间横向联系的影响。

第二,虽然浪潮触发天然与国际因素有关,但其推进过程的决定性因素不一定是国际因素,浪潮推进时机的决定性因素可以由国际力量或国内力量主导。如果将一国政府或决策群体视为核心的能动者,那么对一国政府或决策群体施加影响的因素(无论是纵向大国动态还是横向国际联系)则是对应的结构力量。^④ 一国是否被卷入浪潮或自愿推动浪潮取决于这一层面的能动者和结构间的互动关系,由国际力量主导的结构型浪潮往往推进速度较快。一旦浪潮受到纵向或横向的国际力量触发,受到影响的相关国家往往被快速席卷进浪潮。在此过程中,国际力量对一国政策或政治变化起到了难以抵御的决定性作用,而该国的能动性本就先天羸弱或难以发挥作用。相比之下,由国内力量主导的能动型浪潮推进进程往往较为缓慢。在这种浪潮中,各国有足够的空间发挥自身的能动性,通过一系列的国内政治互动和决策程序决定是否主动加入浪潮。

① 阎学通:《国际领导与国际规范的演化》,载《国际政治科学》,2011年第1期,第1—28页;G. John Ikenberry and Charles A. Kupchan, “Socialization and Hegemonic Pow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4, No.3, 1990, pp.283-315; Charles A. Kupchan, “The Normative Foundations of Hegemony and the Coming Challenge to Pax Americana,” *Security Studies*, Vol.23, No.2, 2014, pp.219-257。

② Lucan Way, “The Lessons of 1989,”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22, No.4, 2011, pp.20-22。

③ 陈敏华:《集群式革命之“阿拉伯之春”》,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3年第3期,62—70页;释启鹏、韩冬临:《当代社会运动中的政权崩溃——“颜色革命”与“阿拉伯之春”的定性比较分析》,载《国际政治科学》,2017年第1期,第130—155页;Kurt Weyland, “The Arab Spring: Why the Surprising Similarities with the Revolutionary Wave of 1848?”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10, No.4, 2012, pp.917-934。

④ James Mahoney and Richard Snyder, “Rethinking Agency and Structure in the Study of Regime Change,”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34, No.2, 1999, pp.3-32。

如表1所示,基于触发因素和推进因素这两个维度可构建关于浪潮的四分法:纵向结构型、纵向能动型、横向结构型和横向能动型。扎卡里·埃尔金斯(Zachary Elkins)和贝丝·西蒙斯(Beth Simmons)曾区分了“作为结果的扩散(diffusion-as-outcome)”和“作为过程的扩散(diffusion-as-process)”两种政策扩散路径,但他们仅将浪潮视为对扩散结果的描述。^①相比之下,本文对浪潮概念的类型化细分有助于兼容对扩散结果和过程的关注:一方面,浪潮指涉扩散的结果,能够描绘前文所述的结构层次上的“涌现属性”;另一方面,对浪潮属性两个维度的区分是探索扩散过程的基础,既有文献中关于扩散机制的讨论暗含着不同属性浪潮之间的联系。例如在分析自由主义的国际扩散时,西蒙斯等人总结了强制、竞争、学习和模仿四个机制,^②这些机制与其说描述了政策扩散的过程,不如说是组成扩散过程的片段,它们可以共同或者单独被纳入浪潮的生成进程中理解。竞争、学习和模仿三种机制暗含的假定是国家的决策者有足够的空间来发挥能动性,基于自身判断做出相应政策选择,其促成的浪潮往往是能动型的。相比之下,强制机制则明示了自上而下的结构性力量的作用,它通常与纵向结构型浪潮相联系。

表1 浪潮的四种类型

推进机制 \ 触发机制	纵向力量触发	横向联系触发
	纵向结构型	横向结构型
结构主导时机		
能动者主导时机		
	纵向能动型	横向能动型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总之,本部分关于世界政治浪潮的分类法既是对政策扩散结果的描述,又能够抽象地兼容构成扩散过程的各类具体机制,从而构成本文研究所需的结构性视角。这一概念框架有助于更加准确地判断“一带一路”的属性,并探究其维持和推进的长远意涵。

(二)“一带一路”浪潮的肇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在浪潮触发因素维度上,“一带一路”的构想、推进、深化和拓展都有赖于中国特

^① Zachary Elkins and Beth Simmons, “On Waves, Clusters, and Diffus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Vol.598, No.1, 2005, pp.36-38.

^② Beth Simmons, Frank Dobbin and Geoffrey Garrett, “The International Diffusion of Liber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0, No.4, 2006, pp.781-810.

色大国外交的展开,因此“一带一路”浪潮属于纵向力量触发浪潮。第一,在顶层设计层面,“一带一路”是中国开展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一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一部分,^①“一带一路”则旨在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②在中国共产党加强对外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背景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被正式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从而在制度和组织层面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建设“一带一路”的信念和意愿。第二,在顶层设计之下,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协调、规划、商洽和实施等工作涉及中国众多部门,体现了国家较强的整合和动员能力。例如,设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承担统筹职责,商务部、外交部、财政部以及其他相关部门都扮演重要角色。^③第三,推动“一带一路”需要广泛而深入的对外交往,除去必要的“硬”物质资源投入外,还需要中国投入大量“软”的双边和多边关系资源。在双边关系上,“一带一路”相关合作文件的商谈主要通过频繁而有效的外交沟通渠道,其中合作文件签署环节需要双方高官甚至首脑亲自在场,这涉及繁杂的磋商和后勤程序。在多边层次上,以联合国为首的国际制度成为中国围绕“一带一路”倡议沟通意图、谋求支持的重要平台;^④针对各地区的“中国+N”机制使中国得以在“一带一路”相关议题上展开整体性交往;^⑤近年来主场外交也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⑥已举办两届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是其中的典型案例。

(三)“一带一路”浪潮的推进:参与国的主动调适

在浪潮推进时机维度,“一带一路”浪潮属于能动型主导时机浪潮。中国的相关理念和政策不是迅速在各国直接发生作用,促使各国在短时间内选择加入这一倡议的;相反,是否加入共建“一带一路”最终是一国的内部决策。^⑦因此,尽管“一带一路”浪潮从触发因素上看是纵向浪潮,但其作用渠道并不是难以抵御的、自上而下的强制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5页。

② 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载《光明日报》,2017年12月2日。

③ 傅梦孜、徐刚:《“一带一路”:进展、挑战与应对》,载《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3期,第89—91页。

④ 谢来辉:《“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的关系——一个类型学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期,第34—58页。

⑤ 孙德刚:《合而治之:论新时代中国的整体外交》,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4期,第53—80页。

⑥ 陈东晓:《中国的“主场外交”:机遇、挑战和任务》,载《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5期,第4—16页;凌胜利:《主场外交、战略能力与全球治理》,载《外交评论》,2019年第4期,第1—31页。

⑦ 必须强调的是,本文在此关注的是浪潮推进时机的决定机制,即各国是否发挥能动性左右了参与“一带一路”的时机。这一判断并不需要假定各国发挥能动性的具体情境和路径都是一致的。正如后文指出的,各国的决策过程受到各类因素的不同影响。不同国家“一带一路”决策机制的异同及一般化规律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议题。

力,这为各国发挥能动性提供了充足的空间。

第一,中国提出并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时便已承诺给予参与国充分的能动性,各参与国可自行调适以与中国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相契合。正如中国需要投入国内和国际资源推动“一带一路”一样,参与国也需要不同程度地动员自身资源方可促进相关举措的落实。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不少中国学者建议突出其他参与国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和主动性,淡化所谓“中国主导”“中国谋略”色彩。^①这些观点提出尊重和鼓励其他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能动性,也意味着中国并不寻求以一己之力决定其他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时机和进程。第二,由于中国没有施加强制压力使各国接受“一带一路”,其他国际政治考量因此会影响不同国家的具体决策,进而影响“一带一路”的具体时机和进度。相关国际政治因素包括对中国意图的认知、对“一带一路”对地区政治经济秩序影响的判断、对相关国家力量对比趋势的评估和对与不同国家双边关系的权衡等。^②需要指出的是,国际因素会产生影响并不意味着决策者无法发挥能动性,最终决定仍然是基于各国的判断和认知做出的。第三,各国的国内形势构成其发挥能动性、做出不同决定的基础。一国的政权结构及领导人更迭、经济社会发展谋划、国家与社会关系以及公共舆论等因素都可能塑造决策者共建“一带一路”的态度和决心。^③

(四) 小结:以能动性为基底的“一带一路”浪潮

基于本部分的讨论,本文提出“一带一路”浪潮属于纵向能动型浪潮。纵向属性意味着中国作为发起者和倡导者的能动性至关重要。能动属性则意味着这一浪潮的推进时机取决于众多参与国自身的态度和选择,它们的能动性对于“一带一路”的全球扩展不可或缺。因此,“一带一路”浪潮的纵向能动属性彰显了中国与各参与国双

① 时殷弘:《“一带一路”:祈愿审慎》,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7期,第152页;曾向红:《“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想象与地区合作》,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期,第65—66页;李向阳:《“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与机制化建设》,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5期,第60页。

② 相关讨论参见毛悦:《从印度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与反应看印度外交思维模式》,载《国际论坛》,2017年第1期,第34—41页;卢昊:《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变化、特征与动因分析》,载《日本学刊》,2018年第3期,第63—80页;张超哲、高雅:《印度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演变、动因及应对》,载《南亚研究季刊》,2018年第1期,第86—93页。

③ 参见潘玥、常小竹:《印尼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反应及中国的应对建议》,载《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5期,第50—56页;周方治:《东南亚国家政治多元化及其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载《东南亚研究》,2017年第4期,第52—80页;周亦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权更迭模式识别与影响》,载《国际展望》,2020年第3期,第97—113页;钟飞腾、张帅:《地区竞争、选举政治与“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剖析所谓“债务陷阱外交”论》,载《外交评论》,2020年第1期,第20—64页;Lucio Blanco Pitlo III and Aaron Jed Rabena, “Philippine Perspectives 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Yue Yang and Fujian Li, e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SEAN Countries' Perspectives*,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mpany, 2019, pp.165-190.

方的能动性,这一浪潮本质上是以能动性为基底的。事实上,这种属性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初就已经反复强调,凸显了共建精神。

精确定位“一带一路”浪潮的属性有助于加深对“一带一路”本身的理解,使之与世界政治中的其他浪潮区别开来。一方面,“一带一路”浪潮有别于各种横向浪潮,它是由纵向力量触发的,其肇始和发展离不开中国的作用;另一方面,“一带一路”的推进历程既不涉及中国利用权势在短时间内强行推广,也不存在某种横向国际联系促成的迅猛扩散,因而有别于其他结构型浪潮。“一带一路”的共建进展及推进时机本质上是由各参与国自行调适的,国际结构力量无法独立决定“一带一路”浪潮在何时何地扩展,各国决策者有充分的时间和余地来决定是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本部分在理论层面对“一带一路”浪潮进行了属性推断。在中国和各参与国共同发挥能动性的前提下,“一带一路”是如何具体推进的呢?系统地检视这一浪潮的生成历程不仅需要概念上的抽象辨析,更需要基于经验证据将这一动态过程描绘出来。本文推断,作为一种纵向能动型浪潮,“一带一路”扩散的时空规律更有可能呈现一种空间集聚效应。为了验证“一带一路”浪潮的推进是否伴随着时空上的集聚特征,本文利用经验证据来考察以下两个可观察的假设:

假设1:一国的邻国中加入“一带一路”的国家数量越多,那么该国加入“一带一路”的概率也会越大。

假设2:一国越是毗邻规划中的“一带一路”初始沿线,^①那么该国加入“一带一路”的概率也会越大。

本部分的讨论主要是基于“一带一路”的触发机制和扩展机制两个维度的定性讨论,下文将通过“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签订的时空数据来检验这一浪潮的生成和发展是否具有时空集聚规律。^②

四 研究设计与实证分析

(一) 因变量

本文创建了一个时间跨度为2013—2019年、包含192个国家(不含中国)的面板

① 尽管“一带一路”不限国别范围、不搞排他性制度设计,但一般认为中国最初对“一带一路”的构想涉及65个国家。参见《“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和地区名单及概况》, <http://ydy1.people.com.cn/n1/2017/0420/c411837-29225243.html>, 访问时间:2020年11月24日。

② 值得说明的是,下文基于观察数据(observable data)的定量分析所揭示的并不一定是因果关系,也无法直接检验“一带一路”浪潮在能动者维度的具体机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无法直接观测能动者决策的过程。

数据集,采用的分析单位是“国家—年(country-year)”。^① 由于第一份“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在2014年签署,且下文的回归分析将自变量滞后一年以避免循环因果可能导致的偏差,本文因变量样本的实际跨度为2014—2019年,样本量是1152个。^② 本文的因变量 Y_{it} 表示国家 i 在 t 年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情况”。“参与情况”是一个国家—年层次上的哑变量(dummy variable),测量国家在某一年是否选择加入了“一带一路”倡议。具体而言,如果两国政府间签署了备忘录、合作协议等合作文件或是发布了有关“一带一路”的联合声明,则表明该国选择加入,赋值为1,否则为0。

(二) 自变量与控制变量

根据前述假设,本文的主要自变量有两个:一个是一国邻国参与“一带一路”的情况。为此,需要先创建一个空间矩阵 W ,用 w_{ij} 来代表国家 i 和国家 j 是否为邻国,其中 $i=1,2,\dots,n, j=1,2,\dots,n$ (n 表示本文研究包括的所有192个国家)。本文构建的空间矩阵 W 是一个 192×192 的邻接矩阵(adjacency matrix),其中对角线为0,表示排除国家和自身为邻国的情况。遵循国际惯例,本文采用了两国最小距离为400千米作为划分是否为邻国的标准。^③ 在下文的稳健性检验中也采取了最小距离分别为0千米(直接接壤)、50千米和200千米作为替代性的测量标准。^④ 将 W 与 y 相乘,可以得到一国邻国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情况,也可表述为 Wy ,即空间滞后变量(spatial lag)。^⑤ 另一个自变量是哑变量“初始沿线国家”,用来测量一国是否在中国最初规划的“一带一路”沿线建设范围内。

① 在线附录中(<https://doi.org/10.7910/DVN/N8B5BC>),我们展示了2014—2019年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情况。可以初步看出,各国加入“一带一路”建设在时间和空间上均呈现集聚特征。“一带一路”参与国所在区域从中国初始规划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逐渐扩展到其他区域。与此同时,仍然可见未参与国家散布在参与国较多的区域中。这从侧面体现出“一带一路”浪潮并非由上而下席卷各国的,而是充分保留了后者的能动性。

② 将自变量滞后一期的另一个优势是,本文使用的几个控制变量数据只更新到2018年,而解释2019年的结果正好使用2018年的数据,避免了遗失过多样本。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库克群岛、纽埃、巴勒斯坦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且签署了合作文件,但由于缺少相关数据,因而在后续的实证研究中未纳入样本。另外,2020年1月至2021年1月仅有基里巴斯、刚果(金)、博茨瓦纳三个国家与中国签署了合作文件,因此本文实证分析的时间跨度并没有显著丢失有效数据点。

③ 这样不仅可以包括陆上邻国,也可以包括一部分隔海相望的邻国。

④ Nils B. Weidmann, Doreen Kuse and Kristian Skrede Gleditsch, “The Geography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 CShapes Dataset,”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36, No.1, 2010, pp.86–106.

⑤ 一般采取的空间滞后变量是 $W_{y_{t-1}}$,由于我们采用的是静止的(static)空间面板数据,因此在后面的分析中将 W_{y_t} 滞后一期是等同的。这一变量的操作也可参考陈冲:《机会、贪婪、怨恨与国内冲突的再思考——基于时空模型对非洲政治暴力的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8期,第106—107页;陈冲、庞珣:《非洲恐怖袭击时空规律的大数据分析——基于GIS技术和分离总体持续期模型》,载《外交评论》,2020年第2期,第135页。

同时,本文控制了一系列可能影响双边关系以及个体是否参与“一带一路”的变量:一是控制了“与中国建交历史长短”,这一变量计算了从建交年到观测当年为止与中国正式外交关系存在的时间长短(以年为单位)。截至2019年9月,中国已与180个国家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①二是控制了与中国外交立场的距离这一变量。^②本文利用迈克尔·贝利(Michael A. Bailey)等人根据“理想点模型(ideal point model)”对联合国大会投票记录计算的“理想点”作为国家外交立场或偏好的代理变量。这一变量计算了目标国与中国在理想点得分的差值的绝对值,其数值越大,表明两国在外交立场上的偏好差距越大;反之亦然。^③三是考虑了目标国对中国的贸易依赖程度,测量为目标国对中国的进出口额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即“进口贸易依赖度”和“出口贸易依赖度”以及目标国对中国的军售规模。与中国的双边贸易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的世界综合贸易方案(WITS)数据库,^④GDP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发展指标数据(WDI),^⑤与中国的进出口军售数据(2013—2019年)来自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武器交易数据库(SIPRI Arms Transfers Database)。^⑥四是控制了一系列有关国家个体属性的变量,包括政体类型、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稳定程度和人口等。政体类型数据来自“多样性民主项目(Varieties of Democracy)”,该数据通过专家评分方式产生了包含1789—2019年的202个国家和地区的指标,本文选取其中的“自由民主选举特征(v2x_polyarchy)”这一指标作为政体类型的代理指标。^⑦人均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日期简表》, 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2193_674977, 访问时间:2020年6月10日。

② 庞珣、陈冲:《国际金融的“赫希曼效应”》,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6期,第132—155页。

③ Michael A. Bailey, Anton Strezhnev and Erik Voeten, “Estimating Dynamic State Preferences from United Nations Voting Data,”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61, No.2, 2017, pp.430–456.

④ World 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 “China Exports by Country and Region in USMYM Thousand 2013–2018,” <https://wits.worldbank.org/CountryProfile/en/Country/CHN/StartYear/2013/EndYear/2018/TradeFlow/Export/Partner/ALL/Indicator/XPRT-TRD-VL>, 访问时间:2020年6月10日。由于这一数据只截止到2018年,因此本文使用“多重插值(multiple imputation)”方法计算了2019年的数据,参见 Peter Hoff, “Sbgcop: Semiparametric Bayesian Gaussian Copula Estimation and Imputation, R Package Version 0.975,” <https://cran.microsoft.com/snapshot/2018-05-08/web/packages/sbgcop/index.html>, 访问时间:2021年1月24日。此外,本文使用的数据中,WDI相关数据(人口、人均GDP等)以及进出口贸易数据均只更新至2018年,因此2019年数据均使用多重插值方法计算。由于本文将自变量均滞后了一年,因此实际分析中并没有用到多重插值计算出的数据,即对于2019年的因变量解释使用的是2018年的数据。

⑤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http://datatopics.worldbank.or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访问时间:2020年6月10日。

⑥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Importer/Exporter TIV Tables,” <http://armstrade.sipri.org/armstrade/page/values.php>, 访问时间:2020年6月10日。

⑦ Daniel Pemstein, et al., “The V-Dem Measurement Model: Latent Variable Analysis for Cross-National and Cross-Temporal Expert-Coded Data,” <https://www.v-dem.net/en/data/data-version-10>, 访问时间:2020年6月10日。

GDP 和人口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发展指标数据。本文使用当年发生的政治暴力总数来衡量国内稳定程度,该数据来自乌普萨拉大学的冲突数据项目的地理编码事件数据库(GED);根据国别和年度进行汇总,确保只保留了具有准确记录的事件。^① 五是考虑了美国因素对于他国决策的影响,利用“理想点”数据包含的“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立场差距”变量,同时利用同盟数据(ATOP)计算目标国与美国在当年存在的有效同盟条约的数量。^② 此外,后文的稳健性检验考虑了更多潜在的影响变量。^③

(三) 实证结果

鉴于本文的面板数据结构以及在“国家—年”这一分析单元上的因变量是哑变量,本文主要使用了固定效应广义线性模型(fixed-effects generalized linear model)和多层混合效应广义线性模型(multilevel mixed-effects generalized linear model)。由于混合效应模型可以包含一些不随时间和空间变化的变量(如初始沿线 65 个国家名单),同时也可以控制无法观察的国家和年份等“共同冲击(common shocks)”特征,本文的主要实证结果基本依据这两种模型得出(见表 2)。

表 2 实证统计结果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广义线性模型	混合效应模型	混合效应模型
邻国加入数量(t-1)	0.127 ** (0.0495)	0.814 *** (0.100)	0.136 *** (0.0411)
初始沿线国家	2.719 *** (0.456)	1.099 ** (0.437)	2.648 *** (0.278)
建交历史长度(t-1)	0.00893 (0.00850)	0.0334 ** (0.0131)	0.00889 * (0.00504)
与中国外交立场差距(t-1)	-0.252 (0.302)	-0.570 * (0.320)	-0.259 (0.182)
向中国进口军售额(对数,t-1)	-0.0618 (0.0970)	-0.186 (0.120)	-0.0609 (0.0851)

① Ralph Sundberg and Erik Melander, “Introducing the UCDP Georeferenced Event Datase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50, No.4, 2013, pp.523-532.

② Brett Ashley Leeds, “Do Alliances Deter Aggression? The Influence of Military Alliances on the Initiation of 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7, No.3, 2003, pp.427-439.

③ 关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以及描述性统计参考在线附录中附表-1 和附图-1 (<https://doi.org/10.7910/DVN/N8B5BC>)。

续表 2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广义线性模型	混合效应模型	混合效应模型
向中国出口军售额(对数,t-1)	0.0918 (0.141)	-0.0940 (0.243)	0.0870 (0.115)
政体类型(t-1)	-1.090 (0.790)	-1.890 * (0.983)	-1.080 ** (0.471)
人均 GDP(对数,t-1)	-0.127 (0.117)	-0.0792 (0.168)	-0.125 (0.0791)
对中国出口依赖(t-1)	-1.123 (1.576)	-0.429 (2.145)	-1.110 (1.331)
对中国进口依赖(t-1)	-0.229 (0.220)	-0.274 (0.752)	-0.226 (0.320)
国内暴力数量(对数,t-1)	-0.128 (0.0912)	-0.154 (0.110)	-0.128 ** (0.0555)
常数项	-3.211 *** (0.961)	-1.827 (1.467)	-0.690 (0.969)
年份哑变量	是(2014 年为基准)		
固定效应方差(国家)		4.766 *** (1.568)	
固定效应方差(年份)			2.994 * (1.802)
样本量	1152	1152	1152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差,邻国以 400 千米定义。* p<0.10, ** p<0.05, *** p<0.01。

表 2 共构建了三个模型,其中模型 1 使用了广义线性模型和年份的固定效应,并且将标准差按照国家进行聚类,以应对同一国家内观测样本的非独立性问题带来的估计偏差;模型 2 和模型 3 使用混合效应模型分别关注了国家和年份的固定效应及随机效应。^① 表 2 中的两个核心自变量——邻国加入的数量和初始沿线国家——在不同的模型中均在 95%的置信区间上显著,且回归系数为正,为本文的两个假设提供了直接支持。

① 模型 2 和模型 3 的结果证实了本文结果的稳健性。限于篇幅,下文不对二者做过多解释。

鉴于本文使用的是非线性模型,为了更好地展示核心自变量的影响,我们根据表2中模型1的结果,利用1000次模拟画出了“邻国参与数量”取不同值时的预测概率变化情况。^①图1a显示,随着邻国参与数量增多,一国加入“一带一路”的概率也随之增大。平均而言,当一国有大约12个邻国参与了“一带一路”建设时,其自身选择加入的概率将达到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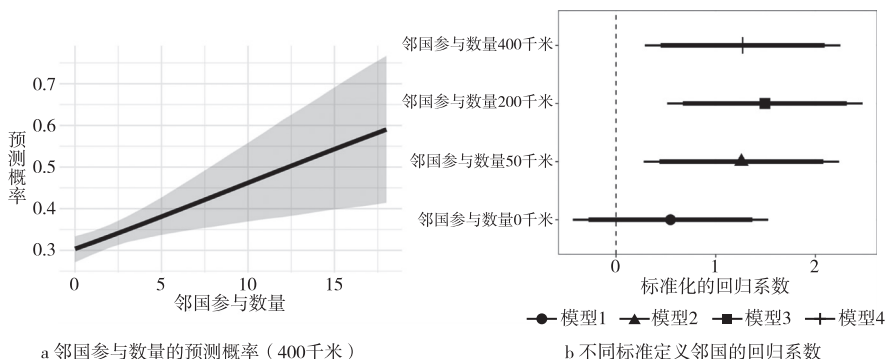


图1 “邻国参与数量”的影响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图1a中阴影部分表示95%的置信区间(基于表2中的模型1);图1a展示了使用不同标准定义(0千米、50千米、200千米和400千米)邻国后的邻国参与数量的回归系数及其90%和95%的置信区间。

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采取了不同的标准来定义邻国。利用CShapes数据,计算了当两国的最小距离分别为0千米、50千米和200千米时的情况。重新利用这三组新的自变量运行了表2中的模型1(其余变量一致)。图1b展示了这三组新的自变量与表2的模型1中“邻国参与数量”的回归系数的比较。笔者发现,仅在采取最严格的陆地直接接壤的定义时,这一变量的系数在95%的置信区间不显著;相反,当邻国的定义从50千米扩展到400千米时,这些变量的统计显著性影响是非常一致的。

利用模拟,图2a进一步展示了四组不同标准的“邻国参与数量”这一自变量取值从最小值变化到最大值的过程中,预测概率变化的1000次分布,同时其他变量在样本中取其真实值。如果分布均远离 $x=0$ 这条垂直虚线,说明边际效应在统计上是显著

^① 模拟的方法来自 Michael J. Hanmer and Kerem Ozan Kalkan, “Behind the Curve: Clarifying the Best Approach to Calculating Predicted Probabilities and Marginal Effects from Limited Dependent Variable Model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57, No.1, 2013, pp.263-277。本文通过R软件进行模拟,使用的软件包参见 Chong Chen, “Postregplots: An R Package for Visualizing Simulation-Based Marginal Effects from Generalized Linear Models,” <https://github.com/cc458/postregplots>, 访问时间:2020年11月24日。

的。例如,在 1000 次模拟中,有 950 次都远离 $x=0$ 这条直线,则相当于 95% 的置信区间。分布在 $x=0$ 的右边,则表示边际效应是正数;当自变量取值从最小值到最大值时,预测的概率会增加。图 2a 再次表明一国的政策选择会受到邻国政策选择的正向影响,参与“一带一路”的邻国数量越多,该国也越有可能参与。

同样,利用模拟方法计算“初始沿线国家”这一变量的边际效应。如图 2b 所示,边际效应的分布均在 $x=0$ 的右边,表明在统计上的显著,即“中方初始沿线覆盖国家”正向影响一国的参与态度。相比于不处在初始规划沿线的国家,如果一国是“一带一路”的初始沿线国,那么其加入该倡议的概率远高于前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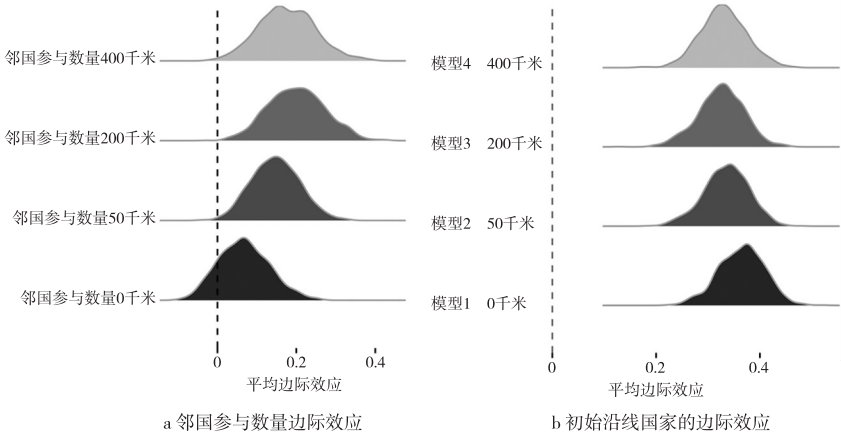


图 2 边际效应分布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本文也考虑了选择偏差问题,即那些位于初始沿线的 65 个国家本身有更强烈的意愿参与“一带一路”。因此本文估计了一个赫克曼选择模型 (Heckman selection model),这一模型的结果表明并不存在显著的选择效应。^① 此外,本文检验了美国因素的作用,发现目标国与美国外交立场的差距在 95% 的置信区间上是显著的,并且回归系数是正数,这表明一国与美国的外交立场差距越大,的确越容易被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所吸引。^② 最后,本文控制了更多可能潜在影响外国加入中国“一带一路”倡

① 这部分的统计结果见在线附录表-2 (<https://doi.org/10.7910/DVN/N8B5BC>),附录表-2 中模型以 400 千米定义邻国。

② 这也意味着一国对美国提供的国际经济公共产品的不满有可能推动其向中国靠近,参见 J. Lawrence Broz, Zhiwen Zhang and Gaoyang Wang, “Explaining Foreign Support for China’s Global Economic Leadership,”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74, No.3, 2020, pp.417-452.

议的因素,包括该国是否是东盟成员国、是否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与中国的地理距离(对数)、与中国的伙伴关系类型、是否与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以及是否与中国签订优惠协定等。^① 在控制了这些变量之后,混合效应模型结果表明,本文核心解释变量的效果依然是稳健的。^② 值得说明的是,本文并非否定这些既有因素的影响,而是要提供一种替代性的解释,囿于篇幅,对于控制的这些因素在此不做更多解读。

五 结论与启示

至此,本文已经基于“一带一路”过去几年的发展探讨了其呈现出来的浪潮属性及其时空扩展规律。综合检视这些研究发现有助于更系统地看待“一带一路”浪潮的维持和推进过程。第一,世界政治中的浪潮各异,并非所有浪潮都是裹挟强大结构压力席卷各国的。本文对“一带一路”浪潮的属性探讨呼应了学界对某些政策话语的反驳。例如,面对近年来西方流行的“一带一路”是中国“债务陷阱外交”工具的话语,中外学者援引实证说明“一带一路”参与国的债务问题不能武断地归因到“一带一路”。^③ 这种对“一带一路”错误的定位事实上赋予了中国过多的能动性,其隐含假定是“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对其他国家施加自上而下的决定性作用的结果,却忽视了参与国自身的能动性及其对“一带一路”推进时机和进度的关键影响。本文第四部分的统计分析也显示,众多关乎与中国双边关系的变量本身对一国是否加入“一带一路”并没有明显的影响。

与此同时,本文结合时空数据的描述和分析表明,中国作为“一带一路”浪潮的触发者对其发展路径仍有着显著正向影响。中国围绕“一带一路”的初始规划以及近年来的延伸努力都对沿线国家产生了明显的吸引效果,特别是初始沿线国家的开展现出更强的加入“一带一路”的意愿。既然“一带一路”浪潮是中国和各参与国共同发挥能动性的结果,那么该浪潮在未来的推进也自然会遇到一些“边界”。“一带一路”不继续扩展到某一国家既可能是中国主动选择的结果(即尚未投入外交资源来谋求与某

① 这部分的回归结果见在线附录表-3(<https://doi.org/10.7910/DVN/N8B5BC>)。

② 这些变量的数据来源于庞珣与陈冲的复制数据,参见庞珣、陈冲:《国际金融的“赫希曼效应”》,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6期,第132—155页。

③ 许少民、李江:《“中国债务陷阱外交论”的发展及其谬误》,载《国际问题研究》,2020年第1期,第40—53页;Ajit Singh, “The Myth of ‘Debt-Trap Diplomacy’ and Realities of Chinese Development Finance,” *Third World Quarterly*, 2020, DOI: 10.1080/01436597.2020.1807318,访问时间:2021年1月24日; Lee Jones and Shahr Hameiri, “Debunking the Myth of ‘Debt-Trap Diplomacy’: How Recipient Countries Shape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0/08/debunking-myth-debt-trap-diplomacy>, 访问时间:2020年10月10日。

国共建“一带一路”),也可能是该国决策者在权衡国际国内政治因素后做出的决定,且这一决定可能长期有效。正如经验证据显示的,“一带一路”的扩展不是线性过程。

第二,虽然“一带一路”浪潮是由中国利用外交工具纵向触发的,但基于时空证据的经验分析表明,在“一带一路”浪潮推进过程中,国家间的横向联系也起到了显著作用,特别是一国邻国的加入对于“一带一路”浪潮的拓展有着正向影响。当然,这一统计分析结果是概率性的,并不意味着一国参与建设“一带一路”必然带动其邻国同样选择参与。一方面,由于各国具有充分空间发挥能动性,这一横向联系对最终政策选择的影响仍取决于各国决策者的中间调节作用。与其他政策扩散现象类似,学习、模仿和竞争等各类机制都可能使一国做出与邻国相同的政策选择;^①同时,这些机制并不必然被激活,一国决策者对邻国信息的处理也可能导致相反的政策选择。

另一方面,即使某国因为各种原因选择不参与,仍然会因为邻国的参与而更加重视并进一步审视这一政策选项。一些既有研究从概念、话语和构想(imaginary)等角度分析“一带一路”,^②这些视角在某种意义上是将“一带一路”视为中国自身持有的观念性物品,并探究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既然“一带一路”已经被140个国家以官方文件的形式认可,那么“一带一路”也不再是中国一国秉持的构想,而是可以视为当前各国共同感知并受其影响的一个社会事实。借用国际规范研究的术语,“一带一路”的参与国数量某种程度上已经达到了“关键多数(critical mass)”。^③正因如此,在意大利2019年决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并与中国签署备忘录后,德国虽然不赞成这一做法并表示不会效仿意大利,但透露可能以欧洲集体身份与中国开展相关的经济合作安排。^④类似地,尽管美国政策界总体上对中国的意图怀有疑虑,一些智库专家仍然建

① 从政策扩散角度对“一带一路”的探索,可见张志原、李论:《“一带一路”倡议的扩散分析》,载《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1期,第130—160页。

② 科林·弗林特、张晓通:《“一带一路”与地缘政治理论创新》,载《外交评论》,2016年第3期,第1—24页;Astrid H. M. Nordin and Mikael Weissmann, “Will Trump Make China Great Aga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4, No.2, 2018, p.232; Lee Jones and Jinghan Zeng, “Understanding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eyond ‘Grand Strategy’ to a State Transformation Analysis,” pp.1415–1439; Dylan M. H. Loh, “The ‘Chinese Dream’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Narratives, Practices, and Sub-State Actor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2019, DOI: 10.1093/irap/lcz018,访问时间:2021年1月24日。

③ 玛莎·芬尼莫尔和凯瑟琳·西金克曾试探性地提出,若国际体系内超过1/3的国家采纳某个规范且一些关键国家采纳该规范,可以视为已经达到“关键多数”。参见Martha Finnemore and Kathryn Sikkink, “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2, No.4, 1998, p.901。

④ Tom Daly, “Europe Wants to Deal with China as a Group: German Minister,”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silkroad-germany/europe-wants-to-deal-with-china-as-a-group-german-minister-idUK-KCN1S20R3>,访问时间:2020年10月10日。

议美国最好正视“一带一路”潜在的裨益,因为它已经不仅仅存在于话语和想象中。^①因此,虽然“一带一路”浪潮可能不会扩展至某些国家,但其不断推进对各国政策议程的影响是清晰可见的。

第三,既然一个浪潮的出现是在一定条件下触发并拓展的结构性结果,那么随着条件的变化,浪潮继续推进过程中遭遇一定挫折也是可能的。在关于民主化浪潮的讨论中,学者们就注意到了浪潮“回卷(rollback)”^②或“逆浪(reverse wave)”^③的现象。在本文讨论的“一带一路”浪潮的案例中,尽管可能不会出现各参与国声明废止备忘录的极端“逆浪”出现,但应正视其继续推进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正如周方银所言,“一带一路”建设的长期性意味着其发展历程势必与国际局势的变迁及各国政治发展在时间上重叠,发生局部逆转的风险很可能持续存在。^④

一方面,拥有充分空间发挥能动性的各国可能因为其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或自身认知的变化改变对于共建“一带一路”的态度。如果说“一带一路”浪潮的生成描绘了其他各国对“一带一路”发展出积极态度的结果,那么反过来也存在一些国家未来对“一带一路”产生消极态度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即使中国保持对“一带一路”的投入力度,即维持住触发这一浪潮的纵向力量,其他纵向力量仍可能制约或抵消中国继续推进这一浪潮的影响。这种消极的纵向力量可能是由另一大国主动施加的。比如,既有讨论指出,在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针对“一带一路”已经或可能采取各类制衡和遏制政策。^⑤消极纵向力量也可能来自体系性的意外冲击。比如,新冠肺炎疫情对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国际合作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⑥

本文表明,“一带一路”的扩散并不仅仅是双边互动简单加总的结果。“一带一路”浪潮不但是纵向力量触发、参与国主动调适的产物,其具体推进历程也受到国家

① Joel Wuthnow, *Chinese Perspectives 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trategic Rationales, Risks, and Implication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28–29; Gal Luft, *Silk Road 2.0: US Strategy Toward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ashington, D.C.: Atlantic Council, 2017, pp.52–53.

② Seva Gunitsky, “Democratic Wave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643.

③ Samuel P. Huntington, “Democracy's Third Wav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2, No.2, 1991, pp.17–20.

④ 周方银:《“一带一路”面临的风险挑战及其应对》,载《国际观察》,2015年第4期,第64—66页。

⑤ 韦宗友:《战略焦虑与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及政策变化》,载《南洋问题研究》,2018年第4期,第65—67页;赵明昊:《大国竞争背景下美国对“一带一路”的制衡态势论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12期,第4—31页;吴心伯:《论中美战略竞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5期,第114—118页。

⑥ 张宇燕等:《新冠疫情与国际关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4期,第4—7页;孙吉胜:《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治理变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5期,第71—95页;傅梦孜:《新冠疫情冲击下全球化的未来》,载《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5期,第7—12页;林跃勤、郑雪平、米军:《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对“一带一路”的影响与应对》,载《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第7—17页。

间横向联系的影响。基于对数据的空间统计分析,本文发现大部分的双边政治和经贸层次的因素都没有显著影响一国是否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但是其邻国是否参与以及周边所有邻国参与程度的高低水平会显著影响一国加入的概率。本文回应了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性质的一些质疑,中国并没有通过双边关系的各类影响直接“换取”其他国家支持“一带一路”,各国具有充分的空间施展能动性。同时,邻国效应是“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的重要力量,各国对“一带一路”的积极态度能够显著地辐射到更大的周边地区,这种效应是独立于中国行为起作用的。为了维持“一带一路”浪潮的势头,中国继续推进“一带一路”的每一步都更当做深做实,让“积极响应”产生更大的回响。

本文也对进一步研究“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向。首先,下一步研究可以具体探索“一带一路”浪潮在邻国间推进的机制,厘清为何邻国间的扩散更容易发生以及如何发生。这需要研究者从结构回到单元展开深度的案例研究,探究难以通过大样本数据直接测量的因果链条。同样,研究者可以从反面分析考察为何即使在有特定机制条件的情况下,“一带一路”浪潮仍然没有覆盖一些国家。如此,各国的能动性在正反两方面都能得到充分体现。更进一步,未来研究可以将二者结合起来,基于既有文献的比较案例分析和本文的大样本分析,在中样本(medium-N)层次上,分类考察各类因果解释的适用性和关联。^①其次,本文研究的“一带一路”浪潮指涉的是各国与中国签署相关合作文件形成的集群现象,因而并不包括对合作层次、合作广度以及合作有效性等其他重要问题的讨论。由于中国与很多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实质性合作仍有待开展,未来研究可以在有较为充足数据支撑的条件下,探索“一带一路”建设在上述维度上的总体规律和具体影响机制。在这些问题的基础上,研究者可以系统性地评估共建“一带一路”的政治经济意义和对国际关系影响。最后,本文的理论视角以及原始数据集为更一般性的浪潮研究奠定了较好的理论和实证基础。浪潮的触发机制与推进过程之间的关系、不同浪潮“生命周期”的影响因素和特定浪潮出现的世界政治背景等问题都值得研究者继续探索。

(截稿:2020年11月 编辑:沈 陈)

^① Stephan Haggard and Robert Kaufman, “Inequality and Regime Change: Democratic Transitions and the Stability of Democratic Rul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06, No.3, 2012, pp.495-516.